



# 田野考古报告的优秀之作

## ——读《潜山薛家岗》



曾 骥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安徽潜山县是皖南山区的一个普通县份。建国以来这里发现了数种最早的龟化石而使潜山县在古生物史、古地质史中蜚声中外。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王河镇潜水西侧的一条狭长的山岗上发现了古遗址,被发掘出来的距今5000多年的史迹是皖南人类历史的一座丰碑,这就是经过多次发掘,发现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文化面貌独树一帜,已被命名为“薛家岗文化”的薛家岗遗址。

薛家岗遗址是一处多文化层次的先秦时代古遗址,从1979年至1982年连续进行五次发掘,2000年又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前后发掘总面积达2300多平方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房址5座、墓葬153座、灰坑56个、红烧土坑9个、红烧土堆积3处、石料堆积1处、水井1口(唐宋),出土各类遗物1600余件。编入这部发掘报告的内容主要是新石器时代1~6期的遗迹、墓葬、遗物及夏商周时代的遗迹、遗物,反映了该遗址历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发掘报告出版前,曾先后在《考古学报》(1982年)、《江汉考古》(2002年)公布过薛家岗遗址的有关考古资料。《潜山薛家岗》的第四、五章主要报告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占了380页,第六、七章报告了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占了90页,上述四章共470页占全书74.3%的份量。另外薛家岗遗址还发现部分唐宋时期遗存包括墓葬、水井、遗物等,第八章作了简略报导。可以看出薛家岗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是以薛家岗文化命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故本文的评述以该报告的这一部分为主。

### 一、绚丽多彩的史前文化

薛家岗遗址的发掘是安徽皖南绚丽多彩的地方性原始文化的首次揭露。报告第四章第四节用较大篇幅刊布了150座薛家岗文化墓葬的资料,墓葬出土物都有插图及器物图版,并对这批考古资料编了项

目详细的登记表(546~567页附表六),编著者研究这批墓葬时,先找出有打破或叠压关系的四组(共十一座墓),又从演变轨迹明显的出土陶器鬲、豆、碗进行类型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排出了薛家岗文化墓葬的五个组别,从而把这个墓地分为五期。在报告415~418页,作者对墓地做了分析并制作了墓地分期分群平面图(图四00),基本上反映了薛家岗文化早晚期的发展过程。这是该书对考古学的重大贡献。

薛家岗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物质文化包括陶器、石器、玉器为主的三大类。生活器皿除了鼎、豆、壶、鬲、碗的基本组合,还有盆、簋、钵、罐、缸、甗、盒、杯、觚、器盖等,陶制品还有非容器类的纺轮、小响球、陶拍子、陶棒(铤)等。石器有刀、钺、镑、凿、镞、杵、砺石,其中用于礼仪的各种奇数孔石刀、穿孔钺很有特色。玉器包括钺、镯、环、璜、管、璧、饰、琮,除了钺、琮可用作礼仪或神器祭品外均为人体装饰佩带用品。发掘报告推出的这些器物类型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薛家岗文化既有文化多源的特点又有独特的个性。二十多年前出土的陶鬲(三足带把壶)、枫叶形足盒鼎、敞口折腹矮足带鋁陶碗、大小不等镂孔、刻纹装饰的陶响球各种奇数孔的多孔石刀、绘有红色花果图案的石钺、石刀、成对共出的九孔石刀、十一孔石刀,刀长达50.9厘米,孔周绘红色花纹的十三孔石刀等遗物组成的器物群,至今仍是薛家岗文化有别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基因”。

《潜山薛家岗》展现了一批江淮史前文化的顶级文化精品。薛家岗遗址发掘之初,发掘者不讳言有挖宝思想(报告610页),因为在此之前长江中游、下游的史前文化,如屈家岭、大溪文化、河姆渡、良渚、崧泽文化都有许多惊人的发现及文化精品出土,地处长江中下游交接点的皖南,不可能仍是一片空白。果然辛苦不负有心人,薛家岗遗址第二、三次发掘出土

了成批珍贵文物。报告彩版三至二十的50多件出土文物可以代表薛家岗遗址的文物精品,它们完善了史前新石器时代长江古文化的辉煌。

报告图版三十九、插图一二〇(第121页)记录了1979年第二次发掘时,第四十号墓(M40)器物出土清理后的现场照片及绘出的平面图。该墓随葬玉器11件、石器13件、陶器6件共30件,其中十四件石、玉器重叠六层堆放,两件九孔石刀左右对称放置,虽说是二十五年前的发现,今天目睹,仍令人感到震撼和兴奋不已。

《潜山薛家岗》封面采用M60(六十号墓)出土的黑皮陶壶形器为版面(另见报告168页图163,彩版六·3,图版七—1),陶壶造型奇特,为第四期文化,属该文化繁荣期,该壶下段圈足似豆,中部器身呈盒状,上部立一泥条塑成双蛇穿环的竖长纽,器肩部纽侧开一小方形口,通高13.2厘米。这类造型在我国至今出土数以十万计的众多史前陶器中,未见第二例。《潜山薛家岗》是一部拥有许多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文化精品的发掘报告。

## 二. 实事求是和严谨的科学方法论是《潜山薛家岗》成为优秀发掘报告的保证

在发掘薛家岗遗址之前,安徽省未曾有过大型遗址的发掘,故在遗址发掘初期,套用以前水平发掘的方法,平均每天下掘10~20厘米,也未做到及时划分地层,迟至第三次发掘,才摆脱水平发掘,有了逐层发掘的意识,1982年秋第五次发掘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思想上和实际操作上彻底摒弃了水平发掘方法,重视遗迹与地层、遗迹与遗迹之间的关系。在清理墓葬方面也经历了对成堆器物的编组到分辨土色、土质寻找墓坑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发掘报告第二章遗址考古小史如实地反映了这些历程,其中有教训也有经验,但实事求是,不断摸索的科学态度终使安徽考古工作者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一部成功的发掘报告,除了提供翔实、准确地考古资料之外,还必须为考古学进一步综合研究创造条件。《潜山薛家岗》没有一般考古报告常见的大篇幅的器物汇总、分型分式的类型学描述,而是以房址、灰坑、墓葬及其它遗迹独个为单位,提供最基础的资料(文字、图、照片)。在本书530~602页中有附表十三份,汇集了地层关系对应、遗物遗迹新编号与原始编号对照、房址登记、灰坑登记、部分灰坑出土陶片统计、墓葬登记、红烧土堆积概况登记、其它遗迹

登记、地层陶片统计、碳十四年代数据、石器鉴定、玉器测试鉴定、多孔石刀孔距及其它6项测量数据等。使用和检索这些表格,可以最全面了解和使用整个遗址的考古资料,可以对应发掘报告的文字、插图、图版,还可以勘校报告失误与疏漏。每种表格的制作,无疑要耗费考古工作者的大量心血,《潜山薛家岗》报告可视为田野考古报告表格化、数码化的楷模。

## 三. 《潜山薛家岗》在编写及内容方面有许多有益的尝试

发掘报告在章节安排上,只有概况而无一般考古报告常有的结束语或总结,代之是附表和附录。例如在概况之后,增加遗址考古小史一章,除了回顾前后六次发掘过程之外,还论及资料整理原则、指导思想、方法、对发掘材料的处理作了必要的说明。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发掘情况,还引用了有关的现场田野日记或田野工作的探方清理草图(见15页、17页、18页、19页)。又如在用所谓“单元卡片式”方法(第29页)编写单个考古遗迹单元(房址、灰坑、墓葬)时,都有概况一段,每座墓葬的单元材料包括发现时间、现场迹象、处理方法等。再对照平面图、器物图、器物照片,可以帮助读者回到考古现场,具有阅读时的真实感。

又如在附录中编入前五次薛家岗遗址发掘主持人杨德标先生撰写的薛家岗遗址考古散记。杨先生用生动而质朴的文字写出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录。告诉人们,那些被称为“尘土学者”的普通考古工作者在参与考古实践的田野中如何进行技术操作,如何锲而不舍的求索,如何获得正确的认识,又如何从必然到自由。此中有疑惑,有兴奋,有教训,有成功,有失误,有快乐,从而了解考古工作者的曲折艰辛,酸甜苦辣。这对于一些无缘参与考古工作的读者会增添阅读该报告的亲切感,胜似读华章。

笔者于1982年秋天与教研室几位老师带领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学生由广州出发经武汉,乘江轮抵安庆直奔潜山薛家岗进行考古教学实习,我们有幸与安徽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参加薛家岗遗址第五次发掘,工地的实习和生活使中大师生们经久难忘。二十多年后,当我们捧读这本凝注着安徽考古同行心血、智慧编著的考古报告时,当年在工地的发掘实习和在省会合肥看到薛家岗遗址以往出土的精美文物的情景涌现眼前,历历在目。我们倍加感激安徽文物考古工作者、感激哺育考古人才的薛家岗遗址。

《潜山薛家岗》也有些不足之处和可以商榷的地方,借此机会提出,供编著者参考。

薛家岗遗址的典型器物鬻(带把三足壶型)仅墓葬出土就有20件,它的形体变化主要是把手部分。1982年考古学报发表薛家岗发掘报告时,参照苏北同类器物误定为鬻。其实约定俗同的陶鬻最早发现于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后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及石峡文化均有发现。近年出版的浙江《好川墓地》也刊布了出土的一批鬻,与江西省山背等遗址的细长颈鬻相似。这些大同小异的陶鬻其显著特点是带流口、三袋足或乳状足,少见实心足,连档耳廓状把手。史前鬻的形状与功能均不同于鬲、甗,大致可分成东方沿海,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三个系统。薛家岗鬻在这几方面都不具备鬻的特点,它的来源可能是从薛家岗遗址中各类陶壶安装鼎足、长把手而成,这类陶壶在薛家岗遗迹数量大、类别多,变化也明显。另外在薛家岗新石器时代第六期文化(已进入龙山文化时代)也发现几件属长江流域系列的鬻残件,它们与薛家岗鬻毫无关系。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就曾把薛家岗这种器物连同青莲岗文化的同类器物称为鸟形壶,并以薛家岗所出土的为最典型。

《潜山薛家岗》第334~335页定名“陶棒”的遗物名称不准确。1982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薛家岗发掘报告时曾对这类遗物(有十三件)定名为铤。以其形态及使用均可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铤相比较,报告人的定名是对的,不知何故在本书中又改称为

陶棒?按铤有铤磨与擦之功能,棒则有敲打、击打之意。

第580~586页附表十一《石器鉴定表》之中不见44号墓的十三孔石刀,作为仅此一件的多孔石刀之最(编号M44:11)是不应漏掉的。又第602页附表十三《石刀测量数据表》序号1标本M6:5有误,查第76页第6号墓出土器物只有四件,未见M6:5编号。第495~516页的插图465~479均笼统标示为夏商周地层出土。究竟何为夏?何为商?何为周?似应分别在各标本号后标示,因为夏商周的器物形态有很大的差别,它们已是可以划分开的先后三个时期的概念。

《潜山薛家岗》是新时期考古学的产物,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呈现复兴和重新崛起的新局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的形势下,更加激活了考古学的生命力,全国各地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日新月异,薛家岗遗址的发现及多次发掘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潜山薛家岗》是安徽省第一部大型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在今天我国已拥有的几百部大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中,《潜山薛家岗》的出版只是迟来的春天,它是众多发掘报告中的佼佼者。我们一开始就说它是“田野考古报告的优秀之作”并非夸张、溢美之说。预祝安徽省有更多更好的田野考古报告陆续问世。

(责任编辑:刘慧中)

(上接第132页)

题后,署“乌朱穆秦奇渥温工布查布述”。

佛寺在中国遍布城乡,有佛寺必有佛像,而佛像之雕塑亦必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否则,既丑化了佛,也是善人弟子对佛的不敬。而用手指量度佛像,比用尺寸量度,要简易些,边雕塑,边用手指量。这种奇妙的办法,只有佛想得出来。后人雕塑佛像,用佛自己说的话来量度,是不会离经叛道的。工布查布为求得佛像的一致性,于清乾隆六年开始编纂解释佛像经,至

十三年完成,请和硕庄亲王爱月居士作序刊印。工布查布对中国的雕塑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像经成为后世雕塑家之必读物,一卷在手,按图索佛,“虽不中,不远矣”!

(感谢范和元先生提供《佛说造像量度经》,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春正月,金陵刻经处版本;感谢刘蒙林先生提供工布查布有关资料)

(责任编辑:周广明)